

看展去

资讯

记留法古埃及学人张凤往事

■ 陶喻之

由上海博物馆、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联合举办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将于7月18日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启幕。对于这些首次来到亚洲的诸多珍贵古埃及文物，还有一条从中国传统金石趣味出发的欣赏线索，指向一位出生于19世纪末的学人。

即将开展的上海博物馆的埃及文物展，令一位去世近一甲子的留法海归，先后执教于沪上暨南、大夏等五所高校，充满传奇色彩的古埃及学人与上海考古先驱重新浮现于人们的视野，他就是文博学家张凤（1887—1966）。

张凤，表字天方，以字行，清末考入马相伯先生设于徐家汇天文台的震旦学院预科，旋投身故乡嘉善的辛亥革命事业，后与李叔同等名家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于文学艺术方面崭露头角。1922年，得省教育厅厅长马叙伦先生赏识，被公派巴黎大学研究院留学；曾于整整百年前的1924年出版法文版中国长篇乐府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向浪漫的法国国民介绍古代中国一桩凄美爱情。同书附《中国诗坛近况》，则重点推介活跃于中国诗坛的新诗人团体。据自撰履历表载，张凤初学诗艺，后改选埃及古文字与历史考古，常出入大学附近克吕尼古物院，且注册为卢浮宫博物院考古班学生；在此期间他着意搜集古埃及及圣甲虫印甚夥，60年代捐赠浙江图书馆的藏书中，就有一本自钤43枚印蜕的《张氏所藏埃及古代甲虫印》。

这批甲虫印原藏于张凤任暨南大学校长等职的真如校舍，1932年“一·二八事变”，地处中日交战前线的暨大毁于一旦，张凤所有收藏亦沦为咸阳劫灰，他于以上仅存印谱上自

题，不胜扼腕痛惜浩叹：

甲虫印非真印也，刻神名现以辟邪。余于留法时，课暇辄至塞纳河畔元老院前搜奇访古，蓄埃及古物遂多，归国后不以示人。二十年（1931）沪地明复图书馆征及外国古董一度展览，沪上印人诧以为异，纷纷请留鸿爪。……决印二套，自存一册……幸免于沪难。越时展视，如观故人。……并记小斋现存埃及古物于后。大木俑一事，小磁胎有字俑四十余，内有精美者八个，已遭兵燹。木鹰大小各一件。小玩艺五十余事。

时南社文人张丹斧1919年创刊沪上满足市井大众消遣为主的通俗报刊《小日报》，于1935年11月7日起到当月底还在“一日一印”专栏，专门连载约廿期“张天方先生所藏埃及古印”。而那时张正率得意门生，持志大学国学系毕业生、建国后华东文化部文物科长、上博陈列与社会历史等部主任蒋大沂等，自发自在江浙沪地区从事包括金山卫戚家墩等古文化遗址的踏勘调查，堪称上海首批田野考古先行者之一。

另据1937年日占嘉善，时值张凤半百生日油印的《生日篇》载：

城池失陷时……搜书三万六千册狼藉不可殁述；……古物库内空无一物。所藏殷商甲骨三百余片，石器数十物，三代铜器有铭者五六事，无字者十余事，矢镞数千，铜兵器车马饰具，杂器不计。汉晋木简幸已出版，底本已毁；汉封泥三百余事，北朝铜石造像五六事，唐人写经二卷有零，碑版字帖砚石十百千计，以及埃及甲虫印五十余事，土木俑五十余事，小古件五十余事，罗马古物四五事等，卅年积蓄，一日沦亡。……故首搜得余上军会呈及于院长覆信后，再三指名踪迹，遣爪牙持所失晋磁杯两只介人问说，谓：所有古物全部可还要亲自认领。不愿，走上海。

此篇最后追忆指“八·一三”抗战前，张凤考察金山卫地理位置后紧急上书监察院长于右任，转请军方务必加强金山海防，严防日寇由此登陆分兵进攻沪宁。稍后战端开启，日军果施此诡计，张凤先见之明得验；故日酋搜得密札亟欲将料敌如神的张凤速获以绝后患，幸时其已辗转奔赴抗战后



1934年秋，张凤（中）与学生蒋大沂、陈松茂三人在上海金山卫戚家墩古文化遗址调查留影，所持系出土完整的几何印纹硬陶器。

方浙西天目山区。当初借胞妹、80年代人编中学语文课本《百合花》的作者茹志娟聚首山乡的建国后上博馆长沈之瑜，也都尊称时任天目书院院长的张凤为师。另据张凤学生、名记者曹聚仁著述，张凤门生尚有1936年筹建上海市博物馆、抗战后出任市立博物馆馆长、建国后为上博副馆长和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教授杨宽。故1945年张凤被聘为市立博物馆筹备委员，并名列1997年版《上海文物博物馆志·人物传略》，据此表明上海文博界始终未忘却这位有贡献于沪上文博事业的长老家。

张凤学贯中西，著作等身，交游广泛。1924年以法文完成毕业论文《甲骨刻字补遗考释》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次年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归国前还作过一桩轰动学界的时髦举措，即以巴黎大学语言学研究室名义，委托百代唱片公司灌录了两首以嘉善方言吟唱自作诗《春愁》与《明珠怨》。时过境迁，这两张长期被封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一隅的黑胶唱片，近年才被有心人拂尘见，令人有幸聆听百年前留洋学子兼诗人发自肺腑乡国情怀的吴侬软语。

张凤留学期间还曾协助被推许为“首位全才汉学家”沙畹的弟子、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编纂遭斯坦因盗窃的西域简牍，奈他归国

后马伯乐久不整理出版。为便于国内学者尽早研究这批飘零异域的遗珍，张凤率先考释并于1931年由上海有正书局付梓《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巨料此举引发师生反目涉讼，马伯乐以侵犯知识产权罪名将张凤告上国际法庭。张凤接招不卑不亢、沉着应诉，以简牍乃中国固有且学术为世间公器为辞据理力争；幸公道自在人心，公案以马伯乐失期在先败诉，张凤赢得涉外官司告终。后马伯乐因二战中参与法国抵抗组织，被盖世太保遣送并死于纳粹最大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迟至1953年其梳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中文献》（又作：《探险所获汉文文书》）经遗孀多方呼吁，才由英国博物馆董事会资助问世于伦敦。

建国后，张凤基本处于退休赋闲状态。时其师尊居高位，学生脱颖而出；但他从不跟自枉屈，有索取一官半职念想，毕生以一介普通群众身份蜗居蕞尔水乡魏塘古镇院落，过着箝食瓢饮、施药课徒的寻常生活；俨若退隐市尘的两位书画家——“元四家”之一吴镇，和自造“沧江虹月”号书画船悠哉游哉的明初姚绶，这位安贫乐道、正直孤介的老知识分子给世人留下一抹云淡风清水墨文人画般的美好印象。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员）

超现实主义百年 它的方向是哲学的

■ 编译/黎文

1924年，安德烈·布勒东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虽然布勒东不是“超现实主义”一词的发明人，但在宣言中将之作为自己的术语，并解释为“纯粹状态下的精神自动症，通过侵犯知识产权罪名将张凤告上国际法庭。张凤接招不卑不亢、沉着应诉，以简牍乃中国固有且学术为世间公器为辞据理力争；幸公道自在人心，公案以马伯乐失期在先败诉，张凤赢得涉外官司告终。后马伯乐因二战中参与法国抵抗组织，被盖世太保遣送并死于纳粹最大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迟至1953年其梳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中文献》（又作：《探险所获汉文文书》）经遗孀多方呼吁，才由英国博物馆董事会资助问世于伦敦。

近日，马克·波利佐蒂（Mark Polizzotti）在新书《超现实主义为何重要》（耶鲁大学出版社，2024）中用当代话语生动重构了这场运动，探讨了它何以能够在百年来持续激发艺术、文学和文化创作者及消费者的灵感。波利佐蒂说，许多流行的媒体样式都由超现实主义而来，包括巨蟒剧团、荒诞剧场以及各种时尚、电影和文学潮流。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在欧洲，比利时、英国、西班牙和布拉格都是超现实主义活动的主要中心。及至往后数十年，在中东、日本、罗马尼亚、挪威、纳维亚、拉美、墨西哥、马提尼克岛及美国，都有超现实主义团体活跃的身影。

超现实主义具有极其强烈的思想独立性，即使这种独立性与流行观点和自己的盟友相左；同时，它秉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将日常生活中的奇妙事物视为一种解放潜力，以此反抗现代生活中的精神苦役。对超现实主义来说，精神自动症的吸引力不在于其可作消遣、乃至炫技，而在于其破坏性的潜力，它是一种刷新语言的方式，一种将语言及心灵从标准化意义的暴政中解放出来的方式。

波利佐蒂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超现实主义通常被认为是视觉艺术或文学运动，但用布勒东的话来说，它的主要目标是“改造世界，改变生活，自上而下地重新塑造人类的认识”。换句话说，它的方向是哲学的，甚至是科学的，而不是美学的。尽管如此，由于该运动主要由作家和艺术家创立，他们的许多作品都以写作（尤其是诗歌）、艺术（特别是绘画、拼贴画和组合物品）及电影的形式出现。到目前为止，这听起来与许多先锋艺术并无不同。但超现实主义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作品涵盖了多种形式和风格，而没有特别强调任何一种：写作可以是诗歌、意识流、片段式自传、主观的新闻报道，也可以是各种形式和风格的混合；绘画亦然。换句话说，它与风格或才华无关：优美的语句或精致的笔触不如作品产生令人颤栗的快乐、帮助我们重新对世界的认识来得重要。这就是超现实主义最想要表达的。

尽管我们都觉得超现实主义是20世纪的事物，但布勒东始终认为，超现实主义的原则早就已经存在了。在《宣言》中，他列举了但丁、斯威夫特、德国浪漫派、爱伦·坡、雨果、兰波、甚至莎士比亚等“可称作超现实主义者的先贤”。从这个角度来看，超现实主义的精神——一种反叛精神，一种不断质疑我们被告知的事实，一种对偶然、意外、对日常生活中的潜在奇妙保持开放的精神——仍然不变。超现实主义可能不再像上世纪二三十年那样具有抢占头条的影响力，但这只是因为它已经走出了美术馆和演讲厅，走向了街头，而这正是最初的超现实主义者们所希望的。

人无金石寿，留得金石名

■ 吴琼



清末出土的西周大盂鼎（局部）。大盂鼎曾为潘祖荫所藏，1951年由潘达于女士捐赠国家博物馆。

光緒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是日日记：“具折请假，赏十日。”
二十七日缺记。
二十八日：“凤石来诊。”
二十九日：“凤石来诊，周姓诊。”

苏州“贵潘”

光緒十六年十月三十日，晚清重臣、一代收藏名家潘祖荫溘然长逝，年仅六十岁。日记手稿的最后一页，泛黄纸面上寥寥几笔，戛然而止。

潘祖荫，字伯寅，小字东斋，号弇楼，撰有《攀古楼彝器图释》，辑有《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他出身苏州“贵潘”潘氏有清一代显贵辈出，被李鸿章称

人名字索引，在研究潘祖荫政务日常、金石鉴赏、生活交游、窥见晚清官场生态等方面有独特的价值。

“勤之一字，无愧也”

生在簪缨世家，又久居中枢，潘祖荫深知谨言慎行的道理。在日记中，他也极少议论朝政、褒贬人物。晚清许多重大事件如戊午科场案、签订《伊犁条约》、中法战争等，极难在日记中寻见踪迹。日记记载更多的是他的“公务员”日常。

潘祖荫为官以勤政著称，除去两年多的还乡丁忧，“入直”“到署”，处理公务，是他生活的主旋律。光緒七年五月十七日，“入直。加班。卯正三上诣观德殿，随行礼”，加班后才到卯刻。光緒七年八月初三，“朝审上班，杨树田呼冤”，次日即“加班，奏朝审呼冤一折”。光緒八年四月十一日至六月十九日，不到七十天时间内，他一共批阅秋审案卷四十五包，且大多是穿插在其他公事的间隙中完成。

潘祖荫对典章制度较精通，在日记中时常记录着装礼仪，尤其是朝会团拜、谒陵祭祀等重要场合，具体到补褂、袍服、帽子、朝珠，都有交代。如光緒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乾清宫，进贺表，补褂挂珠，纬帽蓝袍”；光緒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御乾清宫受贺。蟒袍、补褂、罗胎帽，御前万丝帽”。

才智过人、干练审慎的潘祖荫，屡得“程功智过之役，文字衡校之多”委派。同治六年奉命查勘福建碑楼工程，四月二十三日启程，六月初方回京，行路“实在约计里数一千八百里有零”。潘祖荫主持过多次乡试，也当过会试副考官，阅卷、读卷多达数十次。《秦稿日记》记载丰八年出任陕甘乡试副考官，宵衣旰食，曾与副考官翁同龢“改札艺一篇，彼此斟酌，烛尽而止，则子初矣”。光緒十五年监临乡试，期间他亲自订立武闈规则，各种事项巨细靡遗。

光緒十六年六月，京畿霖雨成灾，永定河决口，灾民流离失所。时兼顺天府尹的潘祖荫奔忙在赈灾的第一线，数次淋雨感冒，积劳成疾，十月底遂染病不治。潘祖荫遗孀“文勤”，从日记中看，“勤之一字，无愧也”。

“囊已罄”

比起家族荣耀、仕途风光，潘祖荫在文物收藏鉴赏上的名声更著。他笃志好古，酷爱收藏，于金石、书画、碑帖、宋元本无所不收，尤爱周铜器与宋元精架，陆续入藏大盂鼎、大克鼎、宋刻《金石录》《广韵》等旷世珍品。光緒九年正月，其

父潘曾绾去世，潘祖荫守制回苏州丁忧，临行前，将部分藏书寄藏于法源寺，三月十六日：“书七十三箱，书架、书匣□件寄法源寺。”另有大批陶器、彝鼎、宋元本、砖石、字画、泉币等，陆续寄存于友生王懿荣家。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宝爱之物他都随身携带，运回苏州了。在苏州的两年多时间，他又有所收获，回京时，行李单中有“铜器、书画、磁器箱一百九十只”。

潘祖荫的收藏来源主要是购买搜求与友朋相赠。步入中年后，随着官阶青云直上，搜罗益广，愈加名声在外，古董商们纷至沓来。潘祖荫本是琉璃厂的老主顾，下朝时常常去流连，博古斋、德宝斋、宜古斋、笔彩斋、茹古斋、墨古斋、永宝斋、润古斋、含英阁等都与他有往来，光緒年间日记里，潘祖荫详细记录着他们上门兜售的物件，以及一笔笔经济账：
光緒十一年六月十七日：笔彩持仲般款来。永宝持阳父直来。
光緒十一年十月十九日：博古送来《圣教》，励衣物，常跋，索二百，还之。含英阁胡于英、笔彩阁樊姓、永宝阁刘姓、润古斋苏姓、马子祥等几位是常来来的古董商。潘祖荫守制期间，胡子英还不时携古器去苏州探访，面见交易。

长期和这些古董商打交道，潘祖荫对他们动辄漫天要价深恶痛绝。同治十一年曾写信给吴大澂抱怨：“市俗居奇种种，可恨，尽已排斥矣。囊已罄，而索值者动辄盈千累百，真不顾人死活也。”对这种“不顾人死活”的加价，潘祖荫有时讨价还价，如光緒十二年十一月底，永宝斋送一鼎“索五百两”，潘祖荫耐心耗着，最终对方主动降价，一百五十两成交。有时他也毫不客气，如光緒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笔彩方鼎，九十。敦子孙父乙，九十。罢议不准再提”。从他们的交往中，我们可清晰感知清末鉴赏风气之盛，以及官员与古董商之往来情况。

潘祖荫以藏友会，与陈介祺、翁同龢、陆心源、吴大澂、王懿荣、姚元等相过从，时常互赠藏品，奇物共赏。苏州丁忧期间，潘祖荫除修墓祭祀，亲戚走动，常与彭慰高、顾文彬、俞樾、沈秉成、李鸿裔、陆心源、吴承潞等赠往来，时而相聚园林、文酒相会。

光緒九年九月初七日，“广安约看古器、石刻、宋本书，留饭。汪七、顾庭来。步顾园”，本日日记天头特别记下所经眼法帖、金石器、宋板十数种。次日，“赴藕园，约看《崔敬邕》、《常丑奴》、《韩敏》、《鹤铭》南村本、黄氏士礼居《温公》、党氏《九成宫》、《高墓志》木方藏本”。

潘祖荫不光收藏出名，亦是鉴宝达

人，眼光毒辣。因法眼如炬，常有友朋求赏鉴：

光緒十一年三月初四：晤彦序，见毛公方鼎，御伯直、敦二、盖一，器皆真。
光緒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薛云阶送一甌来看，晋司徒伯彭父作宝尊鼎，照薛《款识》仿刻者，器真字伪，还之。

朋友如云

潘祖荫天怀仗义，朝野上下乐与之交。为官从政，他遇事敢言，游刃于各势力间而一秉公心。他曾对左宗棠施以援手，对初出茅庐的康有为亦有奖掖赞助之举。生活交游中，他购置金石所费靡多，时常欠债，自己节俭吝啬，却不时资助友朋。李慈铭仕途不顺，在京时生活困顿，经常得潘祖荫周济。如同治二年七月十五日，“赠范客四金”；光緒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范，廿，连前共六十”。李慈铭与潘曾堂、潘曾绾昆仲亦过从，故光緒九年潘曾绾去世时，潘祖荫以铭文请托李慈铭，五月初十，“以《年谱》、二百金寄范客，为先君铭文”。潘祖荫去世后，墓志铭亦是李慈铭所撰。李慈铭在其中回忆两人交往：“庚癸之间，余穷悴不振，公亦贫甚，时或衣衣致馈。”正可与日记相证。

李慈铭的“对头”赵之谦，亦是潘祖荫的座上客。潘祖荫对李、赵皆欣赏，两人在潘宅竟至避不同席。赵之谦不光通金石考据，更擅于书画篆刻，曾为潘祖荫刻印多方。他命运偃蹇，潘祖荫常有赠，亦曾托以潘曾绾墓文。李、赵二人润笔费同为二百两，潘祖荫端水之苦心可见。再如叶昌炽与吴昌硕，亦颇受潘祖荫馈赠提携。

谈及潘祖荫的交游，不得不提的人物是翁同龢。两人同光同齐名，因同出吴郡，出身、履历、官阶、爱好俱相似。同治八年，潘祖荫与翁同龢分任陕甘乡试主、副考官，两人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情谊。《秦稿日记》中计有六首写给翁同龢或与之唱和的诗词作品。翁潘的交往维持了几十年，光緒十六年十月三十日，潘祖荫去世当晚，翁同龢赶去看望，是日日记：
李兰孙信来，云伯寅疾喘呼汗，急驰赴，则凌初平在彼开方，已云不治矣。余以参一枝入剂，入视，则伯寅执余手曰：“痰涌，恐难治矣。”尚手执银镜看方，汗汪然也。李若农至，曰：“参、附断不可用，舌交阴燥，须梨汁或可治。”余曰：“梨汁救命耶？”再入视，益汗。余往横街，甫入门而追者告绝矣，徒步往葬。

对照潘祖荫的绝笔，时间的断点仿佛被接续。潘祖荫走完了他的一生，而历史对他的书写，刚刚开始。